

三

一九七五年五月，作者被解除监护，又从监狱流放到陕西潼关，在潼关县医院“安家落户”。同年八月，中央专案组办公室给作者作了一个结论，令作者签名。因结论同实际情况太不相符，作者拒绝了签名，另给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写了申诉书，如实地陈明实际情况。申诉书只涉及历史、政治方面的问题，关于理论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是一大冤案，申诉书中没有提到。作者在潼关闲着无事，就又想到要把理论方面的冤案向毛主席陈诉。当时作者曾听说，写给毛主席的东西不能太长，不能超过千字，于是一次就只写一个问题，慢慢地写。写过三封之后，又听说“四人帮”横行，信转不到毛主席手里，所以没有发出，一直保存在身边。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作者从陕西回到北京后，将第一封信以《关于“合二而一”的问题》为标题，第三封信以《论恩格斯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关系》为标题，改写成文章，先后在一九七九年《哲学研究》第五期、《江淮论坛》第一期上发表。第二封信是原稿，没有什么改动。收入这一部分的另两篇文章也是在流放期间写成的。其中《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一文，曾在一九七九年《学术月刊》第六期上发表过。

三封未发出的申诉信*

一、关于“合二而一”的问题

首先要声明几点：

(一)“合二而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用中国语言来表达的思想方式，而从一九六四年对于“合二而一”进行全国性的讨伐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产生了一种错觉，好象“合二而一”是杨献珍发明的。我要声明，这是古代思想家的一种光辉成就。我决不敢掠古人之美以为己有，欺世盗名。

(二)关于“合二而一”，我自己仅仅是在课堂上讲课讲到“对立统一”时，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有了这种认识，当作举例，曾提到过方以智的“合二而一”，我自己没有写过关于“合二而一”的文章，也没有“唆使”过别人写文章，也没有替人家修改过这种文章。原写文章的作者都还活着，可以作证。一九六四年《红旗》杂志第16期上发表的批判我的那篇文章是别有用心地夸大其词，与实际情况毫不相符。

(三)当提“合二而一”时，我作梦也没有想到要去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批判“合二而一”刚开始，就已定了性，说是敌我

* 这是在流放期间，为申诉理论冤案，写成未发的三封信。“理论冤案”实际上是文字狱的雅化。

矛盾。还有人说“是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放了一支毒箭”。这是有意陷害诬蔑，把水搅浑。因为我没有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对立起来过。我认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表达方法。中国的太极图是中国古代人的一种最原始的世界观，太极图，说它是“一分为二”也可以，说它是“合二而一”也可以。

我看了方以智的《东西均》中说的“合二而一”时，这个“合二而一”怎样“感染”了我，是经过了一个不甚短的认识过程的。一九五六年列宁的《哲学笔记》中译本出版后，我就买来读了一下。看到《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就在这个地方，列宁在括弧号中写道：“参看拉萨尔所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第三篇（“认识论”）开头所引用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我于是在《哲学笔记》中找到了斐洛的这段话。斐洛说：“因为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把它分为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他们的伟大而光荣的赫拉克利特不就是把把这个原理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并作为一个新的发现而引以自豪吗？”

从此我认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和“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两种说法。前者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一分为二”，后者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合二而一”，二者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用来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但在那时，我还没有这样的认识。特别是读了斐洛的那一段文章之后，我的脑子中有了一种想法，就是，对立统一规律既是一种普遍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种规律能在古代希腊的大思想家的头脑中

得到了反映，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大思想家，难道这种规律不会在他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吗？我想一定也会有的。但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头脑中是怎样反映的，怎样表达的呢？从此，在读书的时候，就留心探寻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中国古代哲学史，但也喜欢翻看一点旧典籍。中国古书上合乎辩证法思想的地方不少，例如“相反相成”，“将欲取之，必姑（姑：暂且的意思——作者）与之”等等，都是合乎辩证法思想的。但我还想找到在表达形式上也和“对立统一”相类似的说法。一九六一年夏，我在西安住医院时，借阅了几部《县志》，其中有一部《兰田县志》，偶尔在其中看到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说宋朝有一位思想家叫吕大临，著有《老子注》两卷，原书据说已经佚失。晁公武介绍这部书的内容，说大概的意思是：“盖以老聃之学，合有无谓之元，以为道所由出，盖至于命矣。”并指出《老子》第十一章为例。《老子》第十一章是这样说的：“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不正是“对立统一”思想吗？“有”就是存在，“无”就是非存在。《老子》的这一章，就是讲的“有”与“无”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合有无谓之元，以为道所由出，盖至于命矣”，这同“黑格尔认为‘存在’和‘无’的统一或不可分性提供转化、生成”，就是形式上岂不也是很相近的么？《中国思想通史》中阐述张载的哲学思想时，说张载曾说过“不有两，则无一……”这样的话。这是一种深刻的思想，是“猜着了”“对立统一”规律的。这是讲“一”与“二”的关系的，就是说，“一”是由“二”构成的。这岂不是同斐洛说的“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是一样的思想吗？“不有两，则无一”，这个“公式”，毛泽东同志也常使用过。毛泽东同志说，“没有矛盾，就没

有世界”，矛盾就是二，世界就是一，正是说的“一”是由“二”构成的。

“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这个对立统一规律，列宁在实际工作中也常常使用过。

下边想从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写的《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一文中摘抄几段，请阅者勿厌其烦地看下去。

“……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实现这两种保护，都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办法，即把我们的国家措施和我们同我们的工会的协商、‘结合’这两方面配合起来。

“关于这种结合，我在后面还要谈到。但单是这一个词就足以表明，在这里给自己捏造出象‘苏维埃工联主义’这样的敌人，就是犯了错误。因为‘结合’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事物，还需要把它们结合起来；‘结合’这个概念含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要善于利用国家政权的措施，来保护全体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政权的侵犯。如果现在的情况不是要进行结合，而是已经结合成功，已经合而为一（着重号都是原有的。请注意《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一九五八年版译文“合而为一”这四个字，在七十年代出版的《列宁选集》同文中，已经被改译为“融合”），那我们就可以召集代表大会来具体地讨论实际的经验，而不是讨论原则‘分歧’或抽象的理论上的概念了。”（见一九五八年版《列宁全集》第32卷，第7—8页）

“其次，从九月起，我们就谈到从重点制过渡到平均制的问题，……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要想办法把重点制和平均制

结合起来，而这两个概念却是彼此排斥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三年半的革命期间，我们在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起来。”（《列宁全集》第32卷，第10页）

紧接着上引的一段，列宁又说，“显然，应当非常慎重而周密地对待这个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如马克思写的《资本论》、马恩合写的《神圣家族》中也有多处提到“合二而一”，或“合二为一”的地方。

毛泽东同志在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时说，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我们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则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这是毛泽东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范例。

很明显，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三年这期间，我是在探寻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对立统一”思想的表达法。这期间脑子里已经有了“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合有无谓之元”，在一定的時候，一定条件下，要“把两个对立面统一起来”等这样一些概念。在一九六三年方以智的《东西均》出版后，见到这个奇怪的书名，出于好奇心，“东西均”是什么意思，书中是讲什么东西的，这样就买了一本回来看一看。翻开看时，就感到兴趣。书中是讲矛盾的问题，他提的矛盾，都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矛盾，根本没有“茶杯与桌子的矛盾”这样一些怪东西。当时也颇有点感慨，感到古代思想家还懂得什么叫矛盾，懂得只有两种正相反对互相对立的东西，才能构成一对矛盾，而我们现代的一位大哲学家，却大讲其“茶杯与桌子的

矛盾”。茶杯与桌子这两样彼此毫不相干的东西竟然能构成一对矛盾，这是我们现代中国哲学家的创造发明。

《东西均》中提出了“合二而一”。我认为这个提法与斐洛说的“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是一样的意思。“合二而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表达法，它同“一分为二”都是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在看《东西均》这本书时，我采取了“合二而一”的提法，我的认识发展过程就是这样，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寻找一种与“一分为二”相对抗的东西来反对毛主席，我自己从来也没有反对过“一分为二”的提法。

列宁曾教导我们，应当非常慎重而周密地对待这个问题，而在中国的“大理论家”、后来成为中央文革顾问的那个人的纵横捭阖、颠倒错乱的指挥之下，许多人却粗暴地作了相反的事，把“合二而一”这个严肃的哲学命题，尽情地揶揄奚落，耻笑诽谤，叫做“批倒批臭”。一九七八年《哲学研究》杂志第一、二期合刊上，还有人提出“‘一分为二’的提法是不是必须用‘合二而一’来补充呢？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话说的未免太武断了，太绝对化了。不是要用“合二而一”来补充“一分为二”，而是二者都是“对立统一”的中国语言的表达法。“结合”这个词，我们大家都不生疏。例如，“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红专结合”、“劳逸结合”等等。在一九六四年围攻“合二而一”时，人们都用“一分为二”来说明“结合”的问题，越说越支离，越说越不通，我想那些批判家自己也会感到不能自圆其说而陷于困窘的泥坑吧。如果有勇气象列宁那样，用“合二而一”来说明什么与什么相“结合”的问题，岂不是顺而且易的事情吗？列宁说，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

当)把两个对立面统一起来(“合二而一”)。那末,在运用“一分为二”这个武器时,是否也有这个问题: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照具体情况具体形势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呢?就当前的形势举一个例,当前要台湾归还祖国,实现祖国的统一;朝鲜也有这个问题,他们也要实现南北朝鲜的统一。在这样的具体形势下,是要“一分为二”对呢?还是要“合二而一”对呢?又如,水可以分解成氢和氧两种气体,可以说是“一分为二”。但是,用氢和氧两种气体也可以制造出水来,化学上叫做“化合”。难道这不是“合二而一”,而仍然是“一分为二”吗?

杨 献 珍

一九七五年初稿

一九七九年二月改写

二、如何正确理解“对立统一” 的“统一”二字

毛主席:

关于“对立统一问题”,在教学中经常碰到两个需要正确说明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对立统一”的“统一”二字如何正确理解;一个是关于“差异就是矛盾”的命题如何正确理解。

前一个问题,表面看来,有点近于烦琐哲学,咬文嚼字,好象不值得重视似的。实际不然。关于“对立统一”的“统一”二字,若有不正确的理解,就会陷于修正主义的泥坑。例如,苏修哲学界曾把“对立面的统一就是对立物的和解”的谬论,尊奉为普遍原则。

我曾想过这个问题：关于“对立统一”的“统一”二字，究竟应当怎样解释，才不至于在政治上犯错误。读列宁的《哲学笔记》时，看到上面摘记了一条，说：

“黑格尔认为‘存在’和‘无’的统一或不可分性提供转化、生成。”（《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7页）

列宁在“不可分性”四字后面还加上括弧注了几个字，说“这个用语有时比统一更好”。

列宁接着写道：“绝对和相对，有限和无限=同一个世界的部分、阶段。不是这样吗？”

这就是说，绝对和相对，有限和无限，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例如，有生物的呼与吸，吐故与纳新，等等，就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呼与吸一分离，生命就完结了。

列宁把对立面的“不可分性”视为辩证的环节，说“辩证的环节”要求指出“统一”，也就是要求指出两个对立面不可分离的联系。

由此看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中，“对立面的统一”的“统一”二字，只是“联系”的意思，只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意思，根本没有“和解”这样的意思。

关于如何理解“差异就是矛盾”的问题。

有人机械地了解这个命题，认为任何差异都是矛盾。哲学家在课堂上讲课，就是这样讲的。听课的人问：茶杯与桌子是差异，但二者有何矛盾，如何形成矛盾？于是哲学家就大讲起茶杯与桌子的矛盾，一直讲了好几年。

“差异就是矛盾”，并不是说，任何差异都是本质矛盾。两个不同的事物之间，如果没有“不可分性”这个条件，这两个有“差异”的

事物就“统一”不起来，不能构成对立面，不能组成一对矛盾。也就是说，两个不同事物之间，没有“同一性”，没有互相联系的条件，这两个事物就不能组成矛盾。这道理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的透彻极了。可是，就是那位哲学家讲《矛盾论》时却大讲茶杯与桌子的矛盾。茶杯与桌子之间有什么互相联系、不可分离的条件？有什么“同一性”呢？这例子也说明许多哲学工作者也还不能正确理解“对立统一”的“统一”概念的意义。

写文章的人在文章中常用“不可分地联系着”这样的话，这不是偶然的。我并没有随便滥用“不可分地联系着”这样的话。有人批评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永远不可分地联系着，那无产阶级还能得到解放吗？”我没有说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永远不可分地联系着这样的话。“不可分的联系”，一般只是说的“有机联系”的意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还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之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资产阶级离不开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也离不开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要得到解放，必须起来革命，革命就是打破这种联系，必须用无产阶级革命打破这种联系，这是不说自明的事。

杨 献 珍

一九七五年九月

三、论恩格斯与思维和存在的 同一性问题的关系

——兼答认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
同一性”论者或中国的巴札罗夫们

关于写这篇稿子的经过说几句话。

马克思在其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一开头就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中国也有一句著名的谚语：“天下事无独有偶。”这似乎成了一条历史规律。关于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谬论，在本世纪就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在本世纪初发生在俄国，扮演悲剧的主角是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巴札罗夫，一次是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初，发生在中国，扮演笑剧的主角姑名之为中国的巴札罗夫们。中国的这场笑剧，从五十年代起，一直演到现在还在继续演。

我的这篇稿子是一九七五年在流放地本是想写给毛主席的。因为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谬论，在一九六四年曾被某个高级理论学校的校长宣布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的最后结论，并说从此以后，不许再提这个问题了，任何党报党刊也不许再

登这类的争论文章了。后来林彪、“四人帮”搞的文化专制主义，事实上从一九六四年就已经开始了。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就成了禁区，至今在某高级理论学校和某权威哲学刊物还是禁区。因此，在一九七五年写此稿时，想诉诸毛主席，希望请他老人家出来打破这个禁区。稿子写成后，当时“四人帮”权势熏天，估计此稿不可能送到毛主席手上，所以也就没有把稿子送出。到了一九七六年，不幸毛主席又离开我们了，要毛主席来打破这个禁区的希望也就破灭了。不得已，只好诉诸全国有良心的马列主义的哲学工作者，希望他们勇敢地起来打破这个禁区。因此现在把这篇旧稿拿出来发表，以就正于一切有良心的哲学工作者。下边发表的，基本上还是原稿，只是某些地方略有改动。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一日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从五十年代初起，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还没有结束，我想应该到了结束的时候了。问题看起来很复杂，实际上又很简单，因为争论的焦点，列宁在一九〇八年已经给我们指点明白并作出了明确的结论。我想把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向同志们说明一下，请求同志们指教。

首先向大家说明一个问题。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问题，我根本没有发表过任何不同意见，更没有发表过任何反对意见。我只是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所讲的，认为它是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而且坚持这种认识，一直

到现在。我认为“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两个“同一性”含义也各不相同，不能把各不相同的东西混淆成一个东西。“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毛主席把“矛盾的同一性”原理，运用到哲学根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所必然得出来的结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个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命题。

什么是“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呢？我从《矛盾论》的学习中得到了启发，认为，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从存在到思维，从思维到存在，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这条桥梁就是实践。我对于“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认识就是这样。哲学史上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说的“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这是一个历史上哲学唯心主义的传统命题，与“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毫不相干，二者没有任何继承关系和渊源关系。

人们说我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这是人们转了几个弯子强加给我的^①。人们说，杨献珍既然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就是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否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是认为“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此后人们便不再说杨献珍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而径直说杨献珍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于是号召人们群起而攻之，一直攻了这多年。我早已处于无法申辩的地位，只好听任人们去攻击。我面临这种攻击，只好自言自语地说一句“无敌放矢”，让人们去满足于精神胜利。

^① 质言之，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所谓“理论权威”实即理论恶霸（按：指康生）的那个人强加给我的。

到现在。我认为“思维和有同一性”与“思维的同一性”，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两个“同一性”含义也各不相同，不能把各不相同的东西混淆成一个东西。“思维和有同一性”，是毛主席把“矛盾的同一性”原理，运用到哲学根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所必然得出来的结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个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命题。

什么是“思维和有同一性”呢？我从《矛盾论》的学习中得到了启发，认为，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从存在到思维，从思维到存在，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这条桥梁就是实践。我对于“思维和有同一性”的认识就是这样。哲学史上的“思维的同一性”，是说的“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这是一个历史上哲学唯心主义的传统命题，与“思维和有同一性”毫不相干，二者没有任何继承关系和渊源关系。

人们说我说“思维没有同一性”，这是人们转了几个弯子强加给我的^①。人们说，杨献珍既然认为“思维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就是不承认“思维的同一性”，就是否认“思维和有同一性”，就是认为“思维没有同一性”。此后人们便不再说杨献珍说“思维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而径直说杨献珍说“思维没有同一性”。于是号召人们群起而攻之，一直攻了这多年。我早已处于无法申辩的地位，只好听任人们去攻击。我面临这种攻击，只好自言自语地说一句“无敌放矢”，让人们去满足于精神胜利。

^① 质言之，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所谓“理论权威”实即理论恶霸（按：指康生）的那个人强加给我的。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争论的过程中，在哲学战线上发生的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我先后向有关方面写过两次较详细的材料，一次是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季写了约两万字交给了高级党校的领导小组。一次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下旬，也写了约两万字，交给了中央专案组。其中都反映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在那几份材料中已经提到了的问题，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就不再提及了。

我已说了我没有说过“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这样的话，也没有同任何人争论过“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所有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或批判，都与我毫不相干，我对这些争论也不负任何责任。

下面我只谈谈有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问题。因为二十年来争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二十年来人们关于这个问题发表了许许多多的文章，哲学研究所已经把这些文章集中起来，印成了厚厚的两本书。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千言万语，可以简化为这样一个问题：

恩格斯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关系”究竟怎样？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二章第二节中说，俄国的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巴札罗夫就是妄图用“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来篡改恩格斯的学说的。

列宁说：“大功终于告成了！恩格斯被改扮成马赫的样子，油炸之后，又加上马赫主义的作料。高贵的厨师们，当心哽住喉咙呵！”（《列宁全集》第14卷，1957年版，第110页）

列宁说：“‘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露骨的意识 and 存在的同一性理论。”（同上书，第

341页)

列宁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同上书,第342—343页)

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代替“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把用语统一起来,以便进行对照比较,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问题归结为如下几条:

(一)俄国的巴札罗夫把恩格斯的学说修改成“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二)中国的巴札罗夫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三)恩格斯自己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说,工人阶级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7页、第2卷第66页)

(四)列宁说,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思想硬加给恩格斯,这是马赫主义者颠倒是非的拿手好戏,把唯心主义硬加给唯物主义的拿手好戏;在这点上我们不能不承认巴札罗夫打破了一切记录!(详见《列宁全集》第14卷,第111—112页)

列宁还说,试问,没有发疯的人在智力正常记忆力良好的情况下,怎么会断言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呢?(同上)

列宁在一九〇八年给俄国的巴札罗夫所作的这个结论,完全适用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札罗夫们。恩格斯到底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没有,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到底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列宁在这里说的如此明白;恩格斯没有肯定思维和

存在的同一性。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这样一来，六十年代中国的巴札罗夫的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也就自然而然被彻底地推翻了。一九七一年一月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的论点，完全是继承了中国巴札罗夫的“两论”的，当然也要跟着“两论”的被推翻而被推翻。

这两篇主张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和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文章，被推翻了。但列宁的这个明确而且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尚未被我国一般干部所知晓。中国巴札罗夫的“两论”在干部当中影响很大，对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已经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具体的实例就是一九七二年四月和一九七三年七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如东县委和石咀山市委干部理论学习的两篇报道。从那两篇理论学习的报道看，中国巴札罗夫的“两论”已把许多干部的理论学习引入了迷途。我建议干部们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二章第一、二两节和第六章第二节，好好学习一下，但同时应把书中的“等同性”一律改为“同一性”。有人说，列宁在这本书中批判的是“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不是批判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是自欺欺人，欺骗广大参加学习的干部，同时也是对列宁的莫大侮辱。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先验论。在批判先验论的学习运动中，没有触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没有对先验论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批判。因此，希望参加理论学习的干部尤其是哲学工作者对批判先验论进行一次补课，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先验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一次认真的批判。这对于干部学习弄通马列主义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哲学工作者的队伍很不纯，有

存在的同一性。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这样一来，六十年代中国的巴札罗夫的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也就自然而然被彻底地推翻了。一九七一年一月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的论点，完全是继承了中国巴札罗夫的“两论”的，当然也要跟着“两论”的被推翻而被推翻。

这两篇主张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和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文章，被推翻了。但列宁的这个明确而且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尚未被我国一般干部所知晓。中国巴札罗夫的“两论”在干部当中影响很大，对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已经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具体的实例就是一九七二年四月和一九七三年七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如东县委和石咀山市委干部理论学习的两篇报道。从那两篇理论学习的报道看，中国巴札罗夫的“两论”已把许多干部的理论学习引入了迷途。我建议干部们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二章第一、二两节和第六章第二节，好好学习一下，但同时应把书中的“等同性”一律改为“同一性”。有人说，列宁在这本书中批判的是“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不是批判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是自欺欺人，欺骗广大参加学习的干部，同时也是对列宁的莫大侮辱。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先验论。在批判先验论的学习运动中，没有触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没有对先验论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批判。因此，希望参加理论学习的干部尤其是哲学工作者对批判先验论进行一次补课，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先验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一次认真的批判。这对于干部学习弄通马列主义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哲学工作者的队伍很不纯，有

不少冒充马克思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者隐藏在里边，至今还没有清理过。通过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先验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真批判，可以把某些真正可以称为哲学骗子的分子暴露出来，借此把哲学工作者的队伍清理一下，也是一件大好事情。

进行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认真批判，必须把一些防空洞塞死。“同一性”与“等同性”本是从同一个外国字(identity)翻译过来的。即在汉文中，“同一”与“等同”意思也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原则性的区别，而有些人硬要加以区别，把“同一性”派给唯物主义，把“等同性”派给唯心主义，说什么“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思维和存在的等同论”是唯心主义，甚至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的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而是批判的“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把“同一性”与“等同性”这样加以区别，就是一个大防空洞。这样区分，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已经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杨献珍

一九七五年九月于流放地